



高|校|学|术|文|库
人文社科研究论著丛刊

历史背景下的 明代文学创作研究

王有景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高|校|学|术|文|库
人文社科研究论著丛刊

历史背景下的 明代文学创作研究

王有景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背景下的明代文学创作研究/王有景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068-5823-6

I. ①历… II. ①王… III. ①文学创作研究—中国—
明代 IV. ①I20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1215 号

历史背景下的明代文学创作研究

王有景 著

丛书策划 谭 鹏 武 斌

责任编辑 成晓春 张桂蕾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崔 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 sina.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铭浩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823-6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各类体裁的文学均取得了新的成就。以正统文学而论,虽然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强权的挤压,从明初到隆庆之前的文坛沉浸在一片寂寥之中,但在嘉靖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明中后期开始在商品经济不断繁荣与刺激下,出现了一些敢于对僵化、死板的程朱理学大加挞伐,为文学的“本色创作”摇旗呐喊的文人与作品。而在正统文学之外,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小说与戏曲以市民文化的代表姿态迅速崛起。就小说而言,除了出现“四大奇书”等文学经典外,还有不少令人耳熟能详的小说作品,打破了正统诗文在以往文学史上的垄断地位,使原本归于“下道”的小说跻身正统文学之列;就戏曲而言,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刻意引导和压制,原本在元代表现突出的杂剧逐渐衰落,而产生于民间小曲的传奇却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产生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昆曲,而且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大量的戏曲文物。由此可见,文学与具体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然而从相关的研究来看,一方面,专门从断代史的角度对明代文学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多,更多地是将明代文学放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框架下,或者是单独将明代文学中最为璀璨的明珠——小说单列出来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或者是用整个文学发展历程的视角对明代文学的概况进行分析,或者是从单个的文学体裁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而忽略了对明代文学整体性的分析。另一方面,一些已经出版的研究明代文学的著作,仅仅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忽略了对明代文学之所以具有特定表现的历史背

景的分析,从而缺少对其文学创作背景的挖掘,因此必然具有一定的不完整性。针对于此,作者站在明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氛围与环境中,对其文学创作进行研究,撰写了《历史背景下的明代文学创作研究》一书。

全书共七章,在总体分析明代文学特性的基础上,按照时间段,站在具体历史背景的氛围中,对各个时期的明代文学进行研究。全书意在删繁就简,为求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地,将明代文学的创作脉络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一方面从纵的发展方向上理清明代文学创作的源流,以便读者对明代文学创作的演变规律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又注意到文学创作横向的影响,从体裁上将各个类型的文学联系在一起,以便读者能看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一面,对更深一步认识明代文学有着启发和影响。总之,全书内容全面、分析透彻、逻辑严密、阐述简洁,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可以为了了解和研究明代文学提供一定的思路。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许多有关明代文学的著作,同时参考并借鉴了学术界同仁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由于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在阅读使用中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本书的修改与完善。

作者

2016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	1
第二节 封建专制主义的帝王文化与文学低潮	12
第三节 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	18
第二章 元明之交的明代文学创作研究	28
第一节 反元大起义与洪武之治	28
第二节 吴中四杰的诗文创作与文学复古风潮的 涌起	32
第三节 长篇小说的初现与文言短篇小说的结集	43
第四节 戏曲的黯淡凋零	60
第三章 永乐至宣德时期的明代文学创作研究	65
第一节 永乐盛世与仁宣之治	65
第二节 台阁体诗与诗文作家群的创作	72
第三节 小说创作的萧条	81
第四节 杂剧的异化与衰落	85
第四章 正统至弘治时期的明代文学创作研究	92
第一节 土木之变与弘治中兴	92
第二节 景泰十才子与江南布衣文士的诗文创作	96
第三节 性理派与茶陵派的诗文创作	110
第四节 文言小说创作的复苏	124

第五节 南戏的演变与传奇的八股化	129
第五章 正德嘉靖时期的明代文学创作研究	136
第一节 武宗南巡与议礼之争	136
第二节 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实践	141
第三节 吴中派与唐宋派的诗文创作	153
第四节 文言小说的新变与通俗小说的重新起步	163
第五节 风情剧、讽刺剧与传奇戏曲的初兴	168
第六章 隆庆万历时期的明代文学创作研究	176
第一节 隆庆新政与万历中兴	176
第二节 公安派与竟陵派的诗文创作	182
第三节 文言小说的创作	196
第四节 通俗小说的繁荣	202
第五节 传奇戏曲创作的极盛	211
第七章 天启之后的明代文学创作研究	221
第一节 阉党干政与崇祯治乱	221
第二节 百花齐放的诗文创作	224
第三节 拟话本的繁荣发展与时事小说的崛起	233
第四节 明末其他小说的创作	249
第五节 才子佳人传奇的盛行	259
参考文献	270

第一章

绪论

代元而兴的明王朝,统治中国达 276 年之久。期间,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开始步入晚期,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不断加深,这对封建统治产生了一定的威胁。为了阻止和延缓封建制度的衰落与解体,明初的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大力推行诛灭异端的文化一统政策,从而使明初文坛呈现出一派保守沉寂的肃杀现象。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不断繁荣与刺激下,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一带的市镇破土而出,使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渐渐兴起了一股反传统的浪潮,异端学说纷起杂陈,与明初灰暗沉寂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一节 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

明代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期间,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并开始影响文化领域,推动了以俗文学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形态。

一、商品经济的繁荣

宋元时代逐步兴起的商业经济,在明初受到了一些挫折。朱元璋一方面在政治上大力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

在经济上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经济,采取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这些统治手段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工商势力,影响了城市的繁荣,甚至连素来商业繁荣的苏州,都在一段时间里变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王锜《寓圃杂记》)。

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渐稳定,历经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自耕农户和中小地主的数量大大增加,耕地面积和官府的税银收入不断攀升。统治者在为农业复苏铺平道路的同时,实际上也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降低商业的税率,鼓励手工业工人“自由趁作”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举措便是贯通了南北大运河,这一措施不仅畅通了南北物资运转的渠道,而且有利于南北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到明代中期以后,官方认可的抑商政策也开始松动,工商势力重新活跃,尤其是在江南一带,手工艺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且内部分工更加细致,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加强了其产品对市场的依附性。此后一段时间,随着海禁解除、工商业的发展,甚至连农业生产也开始卷入商业化的洪流中,商品经济迅速蔓延。具体来看,明代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略见端倪。

(一)农业领域的商品经济

封建社会生产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明代也是如此。不仅统治者如明太祖朱元璋从发展农业和重建社会秩序入手,推动农业生产,而且官僚、士大夫如王阳明等均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从而形成了“重农”的思想。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明代时期,不仅耕地面积迅速扩大,而且农具、农业生产技术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据记载,明末时期,耕地面积已达 783 752 400 亩^①,至永乐时期,明代已是“宇内富庶,赋入盈羨,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禀蓄积甚丰,至红腐不

^①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 页。

可食”(《明史·食货志一》)。明代中期,水稻的种植已由江南扩大到北直隶,闽浙有了双季稻,岭南还出现三季稻,而湖广地区继江浙地区之后,成为中国的又一个粮食高产区,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同时,玉米、向日葵、花生等的引进,使许多无法种植的旱地、山地得到了利用,大大增加了粮食的单产面积。此外,桑、麻、茶、甘蔗、蓝靛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更加广泛,棉花的种植则遍布长江南北、黄河流域和辽东南部。

这些经济作物或粮食作物产量的不断增加,使得明代开始出现了农业商品经济。以棉花为例,棉花种植在山东发展最快,产量居全国首位,还有像江苏松江这样的主要产棉区。而棉花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原料,一个地区大量生产棉花就意味着其他植物的减少,农民生活的某些需要就必须从市场取得。所以,山东、河南一些地区的农田“半植半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物,率从贸易”(《荒政丛书》卷五)。商人们将棉花从这些棉花产地运到江南,即《元明事类钞·木棉谱》中所说的“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衽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于北”。可见,由于农业的快速发展,负责农业产品加工的手工业与农业产地分离,从而使得原料与产品一样成为商品,这就大大刺激了农业领域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手工业领域的商品经济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和更多的劳动时间被集中在手工业生产上。与此同时,随着明代政府对手工业者控制力度的逐渐减弱,不仅如前面所讲的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扩大,而且手工业内部分工也更精细。例如,明代的丝棉纺织业有轧花、弹花、纺纱、织布、染色等内部分工;冶铁业有煽者、看者、上矿者、炼者、取钩(矿)砂者等内部分工;造纸业有舂碓、检择、焙干、扶头等内部分工等。除了这些要求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人员分工协作外,还存在大量的个体手工业者,如铁匠、木匠、染匠、鞋匠、铜匠、银匠、织

匠、窑匠、石匠、铸匠、弹花匠等，这也就是所谓的“百工杂作”。由于一个行业内从业人员的数量很多，因此明代时，手工业领域便出现了行会（帮会）等规范行业内部从业行为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不仅能够平衡行业市场，维护行业同仁的共同利益，将行业同仁联合起来，从而使行业的凝聚力得到增强。与此同时，行会（帮会）组织还能够对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不正当竞争现象进行规范与制裁，对行业内的社会秩序进行维护，对行帮内部的经济利益进行调节，从而更好地处理行业内部的人际关系，使行业得到健康、快速的发展。

由于行业内从业人员较多、分工明确、技艺高超，因此在明代时期虽然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手工业也依然依附于农业而存在，但在南方一些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城镇，这种情况已有很大的变动，如明代时期松江地区出产的棉布，全国驰名，该区域城镇乃至乡村几乎全依赖棉纺织业生活，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之后被运销全国。因此，可以说，在明代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明代一些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开始完全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和独立出来，产生了“以机为田，以梭为耒”（《濮镇纪闻·风俗》）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实际上都是手工业领域内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有效例证。

二、商品经济刺激下的城市文化形态

（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市的崛起

纵观中国古代史便可以发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便已经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到了宋代以后，随着坊市、瓦舍等的出现，城镇迅速兴起并发展，以俗文化为代表的市民文化开始成为城市文化形态的主流。而在南宋以后，随着宋辽、宋金、宋蒙的战争和元代的“蒙汉”二元性统治，以及元末大起义，原本冒出了一些文化苗头的城市皆受到战争的毁坏，因此在明代建立之初，全

国到处田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凋敝。

明代建国以后,先采取“劝课农桑”的安养生息政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放松了工商业的压制,从而使得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这些措施都为城市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前提和基础。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大批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城市和流通领域,产品商品化的程度逐步提高,城乡各地的集市贸易蓬勃发展,不仅促进了各地乃至与他省的经济交流,也使得一些城市如苏州、杭州、嘉兴、松江、广东的南海、江西景德镇、北京、南京、武汉三镇、荆州、沙市以及运河沿岸的德州、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等逐渐繁荣起来。

以开封为例,它是周王封藩之地,水陆交通便利,“车马之交,达于四方,商贾乐聚”。在明代前期,开封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消费性城市,周王宗藩、官僚贵族、豪绅地主多聚集此地,他们依靠俸禄、田产、地租等维持其纯粹性的奢侈生活,城内有许多商业设施和饮食、文化娱乐场所都是为满足这种消费而建立的。但在明代中期以后,在保持这种奢侈性消费的同时,生产经营型以及为满足广大民众生产、生活所需而开设的各类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日渐增多,日用百货类商铺林立,如衣裳布匹、绸缎、手帕、酒类、茶叶、药材、折扇、皮货、雨伞、胭脂、香料、瓷器、首饰、金银、铁器、竹货、漆器、粮食、灯具等应有尽有,此外还有各类手工业作坊如丝织业、棉织业、农器业等遍布全城。因为交易繁盛,所以外地商贾云集于此,“京城、临清、南京、泰安、济宁、兖州各处客来,贩卖不断”(《如梦录》“街市纪第六”)。

又如北京,在洪武初时,整个北京仅 14 970 户、48 973 人,城中的人口就更少了。自明成祖朱棣移都北京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弘治时,北京人口日增、货物充盈。嘉靖后,整个北京城的居民已不下百万,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业渠道取得,不能一日无贸易,各种商品都有,如绸缎、珠宝、玉器、粮食、盐、生药、布、香蜡、茶叶、糖、酒、纸、木料、棉花、靴,还有各种珍奇物品,如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猫儿眼、紫金脂玉、犀角、伽南、商彝、周鼎、秦

镜、汉厘晋书、唐画,还有如成化年间学者桑悦所说的:“南巴之竹扇,广东之藤笥,蕲州抵金之蕈,滇南镂银之簪,江南之姜桂,锡连云委,龙门之筋角旃铁棋置”(《思玄集·北都赋》)。

(二)城市的兴起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

城市的兴旺,使得生活在城市里的市民阶层迅速扩大,这些阶层人数众多,人员复杂,多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手工业者、一般贫民、作坊主、商人、一般文人士子等。在这些市民阶层中,商人们经济实力雄厚,生活奢靡,逐渐引起人们的注目和羡慕。与此同时,商人们也喜欢附庸风雅,常常与一些文人士子往来唱和,而文人士子也逐渐改变了不屑与商人为伍的态度,习惯于出入市井,乐于与商人、手工艺人交游,在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世俗化特征。尤其是在明代中期以后,一些并没有走上仕途的文人或者本身就出身于商家,或者日后为了养家糊口而步入商界。总之,明代中后期文人与商人等市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相互影响,从而使得以诗词等雅文学为正宗,以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为小道的传统文学观念得到改变,文坛上以诗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形式逐渐地让位于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形式。

在商品经济刺激下的俗文学的价值在理论上被予以明确肯定的,是从李梦阳等开始的,如李梦阳将《西厢记》提到了与《离骚》相同的高度。到了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等再一次肯定了俗文化的价值,他们将《水浒传》与《史记》并提,充分肯定了《水浒传》的价值。此后,李贽、袁宏道等进一步肯定了俗文学的价值,如李贽提出,《西厢记》《水浒传》是代表明代文学的重要作品,同时,他还将《水浒传》与《史记》、杜诗等并列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袁宏道将词、曲、小说与古典诗文杰作之《庄子》《史记》《离骚》等相提并论,称《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觴政》之十)。他们的呼声不仅对于进一步打破人们对俗文学的偏见起到了很强烈的作用,而且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也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大力肯定俗文学地位的高潮。此外,这些文人对俗文

学地位 and 价值的肯定,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俗文学创作的发展,再加上市民阶层的壮大和文学世俗化、商业化的发展倾向,明代也形成了一个以创作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为特点的文学高潮。

在这些俗文学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小说创作,特别是章回小说的发展和定型,更为明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做出了贡献。章回小说是一种特定的文体形式,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体制上分回(则)标目;二是在结构上开头与结尾具有模式化的特征;三是在语言上以散文为主、以韵文为辅;四是在叙述人称上以说书人的口吻叙述;五是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①。至于其兴起的时间,一般认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章回小说之始^②,从今存早期版本来看,嘉靖壬午(1522)的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分章分回已经定型,且其每回标题都是单句七字,到万历年间,《水浒传》的每回标题已经发展成双句,且大致对偶,至于崇祯年间,《金瓶梅》的回目已经十分工整完美,因此,曼殊的《小说丛话》称“吾见小说中,其回目之最佳者,莫如《金瓶梅》”。

在体制上定型的同时,明代的章回小说的艺术方面也日趋成熟。其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四部作品清晰地展现了明代小说艺术发展的历程,即由集体编纂向文人独创过渡;创作时常假借历史演义、寓言故事表现现实、关注人生;小说主题大到国家兴废,小到平民琐事,全面涵盖人们的生活;主人公从英雄豪杰到寻常百姓;塑造典型的方法从突出人物特征到用多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的个性;故事情节从线性的流动到网状的交叉;等等。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明代章回小说的

① 历来对于章回小说的特点,各家都有不同的观点,这里所列的几点特征主要是就章回小说的叙述体制而言的,基本是根据各家关于章回小说的论述概括而来的。

② 早期有学者上追两宋,如胡适称“宋为章回小说的发生期”,王国维认为宋元平话是“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大抵因混同话本与章回而来,此一点可撇开不论。

特点,说明了明代章回小说在我国小说史上所取得的成就。

在内容上,明代的章回小说表现出很强的俗文化特点,即在脱胎于宋元说话人的说故事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生活的表象来揭示蕴藏在其中的深刻底蕴,给读者以无穷无尽的启发。例如,《水浒传》以农民起义为载体,反映了人民激烈的抗暴精神,它在文字表述上汲取了宋元话本白话通俗的长处,以《水浒传》第四十二回为例,该回中写在梁山上设宴,祝贺宋江父子团圆,并为公孙胜回乡探母饯行,而黑旋风李逵看到此情此景,就想起自己老娘在家受苦,想把自己的娘也搬上山来“快活”,所以在席散之后就大哭起来,骂道:“干鸟气么!这个也去取爷,那个也去望娘,偏铁牛是土掘坑里钻出来的。”这句话不仅将李逵的愤懑之情准确地表现了出来,而且将李逵鲁莽、粗豪爽直、狂放不羁,但却有一颗纯孝之心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而脱胎于元人《平话西游记》的《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从极乐世界到地府魔怪,从天界瑶池到人间万物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在曲折艰辛的取经途中既看到了“人”的真实,又看到了“神”的传奇、“妖”的虚幻。《金瓶梅》则摆脱了史实与传说的羁绊,将异性之间原始肉欲的艳情描写搬上小说舞台,产生了完全由作家取材于现实生活,并将那个时代的社会丑恶通过各色各样的人物言行反映出来且加以典型化的世情小说。例如,小说第十九回“草里蛇遛打蒋竹山”中通过写西门庆如何用四五两碎银子收买“草里蛇”充当打手,“草里蛇”“接了银子,扒倒地下磕了个头,说道:‘你老人家只顾家去坐着,不消两日,管情稳拍拍教你笑一声’”。仅此一笔,就把“草里蛇”这个奴才的流氓嘴脸勾画出来了。西门庆回家又对潘金莲说道:“我有一件事告诉你,到明日,教你笑一声。你道蒋太医开了生药铺,到明日,管情教他脸上开果子铺出来。”“教你笑一声”,以害人为乐,这淡淡的一笔白描,把西门庆那奸险、狠毒的性格本质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明代章回小说的通俗性特征,也说明了当时小说创作的趋俗倾向。

在明代的俗文化领域中,除了小说之外,另一个俗文化的代

表便是戏曲,它在元代戏曲高度繁荣的基础上,先由宋元南戏演变成传奇,之后又通过美化声调、唱腔,丰富乐器伴奏,加入舞台表演等使其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史中一种较为完整的,以供市民阶层取乐的表演艺术形式,并之后长期在城市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以明代戏曲中最具特色的弋阳腔为例,它是在改编昆山腔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唱词通俗易懂,群众较易接受,而且在歌唱时常常伴随着喧闹的锣鼓等打击乐器,从而容易营造出热闹的氛围,这一点也充分满足了市民阶层喜爱热闹的心理需求,因此明代中后期以后,戏曲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大城市中均存在戏班,一些具有一定文学素养的文人如汤显祖、吕天成、沈璟、冯梦龙、袁于令等均参与到戏曲的创作中,他们或者追求戏曲的才情意趣、歌词音律,或者追求严格的格律、通俗的语言,从而使明代戏曲行业中出现了不同流派争奇斗艳的场景,创造了明代戏曲的一个黄金时期。

在内容上,明初的戏曲由于几代皇帝为了消磨诸王的政治野心,便用词曲使他们沉溺于声色之乐,从而使明杂剧成为统治阶级消遣性情、宣扬风华的工具,像元代前期杂剧那样深刻地反映现实、啼饥号寒、怨天尤人之作几乎很难见到了。同时,明代统治者也加强了对杂剧的控制和利用,使明杂剧在思想内容上出现了封建化加神道化的倾向。因此,明杂剧中有不少作品表彰义夫节妇,歌颂封建礼教,攻击农民起义,表现了浓厚的封建思想。例如,周宪王朱有燬的《清河县继母大贤》,写清河县有异母兄弟王谦、王义,王义不务正业,王母予以责打,并要其外出经商。王义被无赖骗完钱钞,店小二催交房金,为其打死。王谦前去探弟,自愿代弟顶罪。王母则坚持王谦无罪,王义应该受刑。原来王谦为前妻之子,王义为王母所生。官府感王母之贤,赦王义之罪,朝廷并封王母为贤德夫人,王谦为太尉。又如无名氏《薛苞认母》,写薛苞被继母赶出,但后来薛苞的继母及异母弟沦为乞丐,薛苞却热情地收留了他们,并代为还债,是表彰孝子之作。再如,来集之的《铁氏女花院全贞》,写铁铉之女沦为妓女保全贞操,为歌颂节

妇之作。

由于明杂剧在思想、艺术和演出上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倾向,造成了它的衰落。据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作家有姓名可考者 100 余人,作品 520 本。^① 现存剧本有 180 本,多见于《盛明杂剧》和《孤本元明杂剧》,亦见于《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作家作品的数量都和元代相差无几,但它的思想艺术质量却远逊于元代杂剧。

在明杂剧逐渐衰落的同时,原为村坊小曲的南戏(传奇)却在民间迅速发展,南戏本来“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南词叙录》)。其声腔无一定宫谱,只以打击乐按拍,随声转调。故据《南词叙录》载,明太祖朱元璋观《琵琶记》,“寻思其不可入弦索,命教坊奉銮史忠计之,色长刘杲者,遂撰腔以献。南曲北调,可于箏琶被之,然终柔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也”。这种南词北唱的唱腔称为弦索官腔。沈宠绥的《弦索辨讹》有云:“南曲大备于明,初时虽有南曲,只用弦索官腔。”但这种弦索官腔并未通行全国。因为南戏流传各地以后,与各地的语言和民间曲调相结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地方声腔。其中主要是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此后南戏一路迅速发展。至明代中期(成化至隆庆年间),以魏良辅为代表的文人对南戏中的昆山腔进行了改革,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昆山腔的发展,使之风靡全国。明代后期是明传奇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昆山腔已占据统治地位。万历年间胡文焕所著的《群音类选》把昆山腔列为“官腔”一类。于是,海盐腔、余姚腔消歇,北曲杂剧也不再演唱。因昆山腔比较典雅,故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而弋阳腔比较粗犷,在民间仍然盛行,并逐渐演变为各种地方剧种。弋阳腔有许多民间戏班,昆山腔则不但有民间戏班,而且还有许多家庭戏班。因此戏曲演出的繁盛是空前的。

虽然在唱腔形式上,杂剧和南戏有不同的特点,但在内容上,

^① 不包括元明之际的内廷教坊杂剧。